

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 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实证分析

张聪群*

(宁波大学商学院, 浙江宁波 315211)

摘要: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由农村迁向城市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又是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实证分析表明, 第三产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影响, 工业化和第三产业水平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大于当期工业化和第三产业水平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 工业化; 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F323.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06)05-0091-06

一、研究背景

近代工业社会以来,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直是许多国家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农村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由农村迁向城市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又是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共生现象。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唯工业化时期,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一般都肯定这种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认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总生产率, 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刘易斯在 50 年代中期建立了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 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 前者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 后者以传统的农业部门为代表。他认为经济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 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展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拉尼斯(G. Ranis)和费景汉是刘易斯模型的继承者, 他们的拉尼斯-费模型将刘易斯的二元模型向前推进了一步, 人们合称之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他们认为, 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为工业部门扩展提供所需的劳动力, 而且还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业剩余。如果农业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部门扩展对农产品增长的需求, 劳动力转移就受到阻碍。这一点被认为是拉尼斯-费模型对刘易斯模型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但是, 刘易斯模型和拉尼斯-费模型都是建立在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 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且工资水平不变的假定之上, 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符。

1961 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D. W. Jorgenson)创立了不同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的新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他不承认农业有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剩余劳动的存在, 也不认为农业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是固定不变的。乔根森认为, 如果不牺牲农业产出, 劳动是绝不能为工业部门所利用的。从工业部门来看, 实际工资率在长期稳定的上升, 主要取决于两个部门的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他认为, 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农业剩余规模越大, 劳动力转移规

*收稿日期:2006-04-09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N05GL07)。

作者简介:张聪群(1965-), 陕西长武人, 宁波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

模也越大，二者同比例增长。乔根森所指的农业剩余是以最大人口增长率为前提的，不同于拉尼斯和费景汉所说的农业剩余。后者所说的农业剩余与剩余劳动密切联系在一起。

上述三个模型都将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看作为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唯一决定因素。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托达罗模型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失业这一事实的基础上，他认为一个农业劳动者决定是否迁入城市的决策不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还决定于城市就业率或失业率。当城市失业率很高时，即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很大，一个农业劳动者也不会作出迁往城市的决定，他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他认为，迁移者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取决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城市失业人数。托达罗模型特别强调农村和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他并不是把农业作为工业化的一个工具来强调它的发展，而是把它本身作为一个发展目标。在托达罗模型中，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托达罗的这一思想对于矫正我国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方面有两次大的失误和教训。[2]

第一次是 1958 年至 1963 年。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仅 1958 年大跃进从农业转出劳动力 4219 万人，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一年之内翻了一番多。受当时城乡产业布局的影响，从农业转移出的劳动力都流向各类城市，结果造成农业的萎缩和二、三产业的人力浪费。大起必有太落，1960 年后开始强行回流，到 1963 年才恢复平衡。

第二次是 1966 年至 1977 年。一方面实施城市就业壁垒，国家把城市就业控制得很死，农民只有首先转为非农户口之后才能到城市就业。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滞后，在限制农民进城条件下还出现了城市就业困难，又强行将城市知青下派到农村，挤占农村本来就短缺的耕地资源。这种做法既造成了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封闭局面，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强行限制在有限的耕地上，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浪费和素质的退化，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获得了创业和择业的自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发展空间。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 30 个省近 2 万农户的调查监测，2004 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到 10 260 万人，1998-2004 年年均转移劳动力 380 万，年均增长约 4%。[3]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农村资源有限，特别是耕地资源短缺和城乡收入差距悬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依然艰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互动发展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以经济发达、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浙江省为实证研究的对象，旨在为城乡协调发展总结经验。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拉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又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结果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例下降，以该比例作为因变量，代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水平，记为 Y_t ，即 t 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水平。

张培刚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印度经济学家撒克 (S. Y. Thaker) 将工业化定义为脱离农业的结构转变，即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份额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1987 年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认为，工业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基本特征是，“第一，来自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份额一般上升……第二，从事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人口一般也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上述定义虽有差异，但基本观点是趋于一致的，即工业化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我们将这一过程用工业对 GDP 的贡献份额来反映，记为 X_{1t} ，即 t 时期的工业化水平。

第三产业的发展既是经济结构变化的标志，又是推动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第三产业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领域，据有关研究，2004 年在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中，有 60% 转移到第三产业。[3] 因此，我们将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作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模型，以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份额来反映，记为 X_{2t} ，即 t 时期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都伴随着城市化，特别是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后，城市化进程还会加快，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流动，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都会急速扩张和膨胀。[4-5]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城乡人口结构变动的过程，通常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反映城市化水平。我们在整理数据时发现，《浙江统计年鉴》1998年以前有市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统计数据，但对市镇人口的统计是以辖区人口而不是以城区人口为口径，1998年以后对人口的统计仅以公安部门的年报数据为依据时发现，《浙江统计年鉴》1998年以前有市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统计数据，但对市镇人口的统计是以辖区人口而不是以城区人口为口径，1998年以后对人口的统计仅以公安部门的年报数据为依据，只有性别、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分类型数据。由于缺乏可靠、连续、系统的城镇人口统计数据，在模型构建中无法将城市化水平列为解释变量。但已有研究表明，第三产业发展与城市化水平高度正相关。因此，模型中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X_{2t})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代表城市化水平。

本文采用二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作定量分析，对城市化所产生的影响只能用特定时点的数据作以描述。

$$Y_t = a_0 + a_1 X_{1t} + a_2 X_{2t} + \varepsilon \quad (1)$$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分析中采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浙江统计年鉴》，由于年鉴中1985年以前没有按三次产业统计的从业人员数据，因此，本文以1985-2004年的相关数据作为分析的依据(见表1)。

表 1 相关数据汇总表

年份	时期 (t)	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 (Y_t)	工业化水平 (X_{1t})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X_{2t})	城市化水平 (%)
1985	1	54.9	41.8	24.5	
1986	2	53.4	41.3	26.6	
1987	3	52.0	41.4	27.0	
1988	4	51.2	41.2	28.1	
1989	5	52.7	41.1	29.2	
1990	6	53.2	40.5	29.5	
1991	7	53.0	40.5	31.6	
1992	8	52.3	42.6	32.9	
1993	9	47.7	45.8	32.0	
1994	10	45.2	46.4	31.3	
1995	11	44.0	46.3	32.1	
1996	12	43.0	47.4	32.2	
1997	13	42.5	48.6	32.2	(34.0)
1998	14	42.4	49.0	33.0	
1999	15	41.0	49.0	34.1	
2000	16	35.58	47.7	36.3	(40.0) 48.67
2001	17	33.44	46.5	38.4	(42.0)
2002	18	30.97	45.9	40.0	(43.5) 51.9
2003	19	28.30	46.6	39.7	(43.5) 53.0
2004	20	26.06	47.9	39.0	54.0

资料来源: 城市化水平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浙江年鉴》, 其中括号内的数据是原统计口径, 括号外数据是第五次人口普查口径; 其他数据均来自《浙江统计年鉴(2005)》,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年。

三、计算与结果分析

我们采用 SPSS11.5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本文采用的数据是时间序列，由于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和惯性，经济变量前后期是相互关联的，经检验存在序列相关(D.W. =0.437)。经计算自相关系数 $\rho=0.793$ ，作广义差分变换：

$$\begin{aligned} Y^* &= Y_t - 0.793Y_{t-1} \\ X_1^* &= X_{1t} - 0.793X_{1(t-1)} \\ X_2^* &= X_{2t} - 0.793X_{2(t-1)} \quad t=1, 2, \dots, 20 \quad (2) \quad R^2 = 0.526 \quad F = 8.878 \quad (4) \end{aligned}$$

模型(1)变为

$$Y^* = b_0 + b_1 X_1^* + b_2 X_2^* + \varepsilon \quad (2)$$

对模型(2)利用 SPSS11.5 软件处理，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下列回归方程：

$$Y^* = 30.75 - 1.223 X_1^* - 1.514 X_2^* \quad (3)$$

(5.509) (-2.966) (-3.580)

由于样本数较少，R2 较低，但是 F 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3，小于 0.01，序列相关已经消除，常数项和解释变量均在显著水平 $\alpha=0.01$ 下通过检验，说明模型的总体回归效果较好。将方程(3)还原为原解释变量，并整理：

$$Y_t = 30.756 - 0.253X_{1t} - 0.970\Delta X_{1t} - 0.313X_{2t} - 1.201\Delta X_{2t} + 0.793Y_{t-1} \quad (4)$$

其中 $\Delta X_{1t} = X_{1t} - X_{1(t-1)}$ ， $\Delta X_{2t} = X_{2t} - X_{2(t-1)}$ ，分别代表工业化和第三产业水平的增长。

从方程(4)可以看出， ΔX_{2t} 的系数是-1.201，说明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比例比上一年每提高 1%，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例降低 1.201%； ΔX_{1t} 的系数是-0.97，说明工业对 GDP 的贡献份额比上一年每提高 1%，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例降低 0.97%； X_{2t} 的系数是-0.313，说明当期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份额每提高 1%，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例降低 0.313%； X_{1t} 的系数是-0.253，说明当期工业对 GDP 的贡献份额每提高 1%，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例降低 0.253%。由此可见，第三产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影响，工业化和第三产业水平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大于当期工业化和第三产业水平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从逐步回归的过程看， X_{2t} 优先进入回归方程，也同样表明第三产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大于工业化的贡献。

方程(4)中的 Y_{t-1} 既说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惯性，也说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连续过程，表明了巩固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果的重要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和协调发展

浙江经济比较发达，2004年人均GDP达23924元，是全国人均GDP的2.27倍。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从表1可以看出，浙江城市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而全国城市化水平要滞后于工业化。浙江城市化水平2004年达到5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2个百分点。浙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集聚，全省已经形成产值超亿元的产业集群达300多个，集群内企业约13万家，就业人数约600万人，产业集群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约高于全省经济平均增长率3个百分点。据浙江省经贸委调查，2003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149个，工业总产值合计1万亿元，约占全省制造业总量的50%。其中，产值50亿元以上的有35个，100亿元以上的有26个，200亿元以上的有6个。产业的集聚效应不仅表现为人口的集聚，还表现为对生产和生活服务需求的增加，既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又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空间。但自1999年以来，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处于有升有降的波动期。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加快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赖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第三产业发展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收入水平越高，居民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提高以及收入提高后闲暇消费的增加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收入越高，第三产业越发达。2004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是2.39:1，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2004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4倍，城镇居民的高收入形成了对服务的需求，拉动了第三产业的

发展。二是一定的集中和规模化的市场容量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二。在分散的农村，消费容量达不到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最低成本分摊的市场规模。三是比较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三。在分散的农村，第三产业所依赖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较大，因投入不足，第三产业发展缺乏必要的公共设施条件。由此可见，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城市规模和城市化水平高度正相关。但从最近公布的浙江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来看，第三产业总体层次还比较低，批发、零售、餐饮、酒店、娱乐占的比重较高，而物流、金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咨询、科学研究等相对滞后，第三产业的组织规模普遍比较小，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层次和提高规模效益是今后第三产业的发展方向。

(三) 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今后工业化的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化依赖于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来看，浙江的工业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据最近公布的浙江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占0.4%，集体企业占3.5%，私营企业占73.5%，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3.0%，外商投资企业，占3.1%，其余类型企业占16.5%；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就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占1.7%，集体企业占2.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占19.8%，私营企业占53.9%，其余类型企业占22.2%。可见，民营经济不仅加速了浙江工业化进程，而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浙江的工业结构以传统产业为主，大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和外围，原有的发展模式遇到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的瓶颈约束。遵循产业集群发展规律，做大高新技术产业，做强传统优势制造业，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先进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继续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推动工业园区集约化发展，整合提升产业集群，形成一批具有强劲竞争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产业竞争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机制。大力实施名牌带动战略，支持企业创造国家级和世界级名牌。

(四)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连续过程，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已转移劳动力由村民向市民的彻底转变，才能巩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果

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新市民”与“老市民”的平等。因为在城市,子女入学及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等许多福利制度都与户籍制度密切联系。只有统筹城乡就业,实现平等和公平,才能消除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使其彻底转移。制度创新的另一关键领域是农村教育制度和土地制度。在农村除了普及义务教育之外,要加强多层次、多形式、多专业的职业技术教育,大力推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阳光工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受训农民转移就业为目标,着眼于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就业技能的提高。主要通过订单、定点、定向的方式,对用工量较大的餐饮、保健、建筑、制造、家政服务等行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高自身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发展的竞争力。在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要探索土地流转制度,形成既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又有利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制度。

参考文献

- [1]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282-342.
- [2] 罗斌, 殷善福. 论城乡就业统筹的必要性[J]. 农业经济问题, 2001, (5): 35-38.
- [3] 课题组.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及对策[J]. 农业经济问题, 2005, (8): 29-34.
- [4] 朱春燕.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协调发展[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 24-28.
- [5] 马晓河. 中国应走“以大带小, 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J]. 农村经济, 2004, (10): 1-2.
- [8] 赵红英. 浙中山区农动力转移的途径、障碍及对策[J]. 浙江社会科学, 2005, (4): 197-199.

On the Transfer Patterns of Rural Labour Force in Zhejiang

ZHANG Xiang-qun

(Faculty of Busines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ur force is the key to settling the thre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peasants, and it is also the key to construct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There are distinct patterns of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ur forc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even in different areas of the same country. Taking Zhejia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divides the transfer patterns of rural labour force,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ur force in Zhejiang and submits som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 transfer of rural labour force, transfer pattern, thre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peasants

(责任编辑 张聪群)